

# 社會危機中的承認政治學

程平原

對當今的中國社會而言，年末是一道坎，大量累積的社會矛盾會追蹤而來，比如每年這時農民工的欠薪問題。2010年1月26日，廣東一黎姓男子在位於東莞的原公司索要工傷賠償被拒後，脫掉褲子提着兩把殺豬刀砍公司大門。與往年不同，這一事件在新聞記者眼中平添了幾分喜劇色彩。這位暴力追討工傷賠償的農民工在「為權利而鬥爭」的訴求之外頗有一點「為承認而鬥爭」的意味。記者錄下了幾段他的「雷人語錄」，一掃以往印象中極度弱勢的農民工群體的哀憐狀。他彷彿忘記了自己的利益訴求，鏗鏘有聲的皆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飛黃騰達之想。他慷慨道<sup>①</sup>：

我叫黎恩旺，有恩才有旺。黎恩旺，可能要有恩給別人，或者別人有恩給我，這樣我才能旺起來。

我不甘心的原因就是沒有真正享受過一次，……我的享受很簡單，就是在五星級酒店享受一次就夠了，比如說在裏面甚麼都試一次，不用多少錢，你給我三五千塊錢就行了，很簡單的。

死也要讓世人知道，有我這個人曾經存在，所以我說，法律已經阻止不了我了！

這簡直就是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 主奴哲學的文學表達。黑格爾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渴望別人的承認，那個被承認的就是主人。「雙刀客」的冬日敘事在微觀政治中透露出頑強的個體意願訴求，整個場景與對話都是圍繞着「承認」這一主題而展開的，儼然是一個為獲得承認而鬥爭的活劇本。難道在社會矛盾與衝突中「為權利而鬥爭」的格局出現了動搖，新的不穩定因素正在生長？

以暴力追討工傷賠償的「雙刀客」，其敘事在微觀政治中透露出頑強的個體意願訴求，整個場景與對話都圍繞着「承認」這一主題而展開。難道在社會矛盾與衝突中「為權利而鬥爭」的格局出現了動搖，新的不穩定因素正在生長？

## 一 承認的政治學

面對社會快速變遷中被拋出結構外的群體和不公平的社會分配格局，成伯清曾提醒道：「儘管許多現象可以通過相對剝奪感來解釋，但其中也有道義的需求未能得到滿足的原因。我們必須突破狹隘的利益範疇來理解我們當下的社會狀況。雖然我們不應輕易地從經濟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的視角轉向社會承認 (recognition) 的問題，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我們必須重視這個維度在社會現實中的意義。」<sup>②</sup>

被社會承認和接納，是德國學者霍耐特 (Axel Honneth) 「承認政治學」的主題。他指出，相互承認規定了主體之間的關係，從而使被接納的個體認識到自己是社會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sup>③</sup>。這一洞見使我們認識到東莞「雙刀客」事件作為承認政治學的極端標本的存在。實際上，以承認政治學視角來審視我們這個「斷裂」與「失衡」的社會，比一般的利益政治學視角更切近真實。

被社會承認和接納，是德國學者霍耐特「承認政治學」的主題。實際上，以承認政治學視角來審視我們這個「斷裂」與「失衡」的社會，比一般的利益政治學視角更切近真實。

筆者的一個學生給我寫信說：

大學畢業後，我聽了父母的話，得到了一份聽起來不錯的工作。可是進去以後發現自己不過是編外人員，做他們有編制的人一樣甚至還要多的工作，卻只拿到他們三分之一的薪水，也沒有他們可以享受的種種福利。這些我都受得了。我可以為了那份微薄的薪水吃苦耐勞。

但是我無法忍受他們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他們常常會因為其他原因否定我的能力，常常自以為是，常常使用雙重標準。我每天幹着重複機械的工作，不需要思考，更不能提意見，只能按照領導的意思做，即使是錯誤的，即使是像收拾飯碗這類事。但是我又不能離開，因為父母的關係，還是那句，我不能讓他們失望。

每天回家都很累，心情都很不好，但是媽媽不想聽我的抱怨，不想聽我喊累，她說聽了會心寒。我只能把這些都放在心裏，於是每天都睡不好，連做夢都是跳樓自殺的情景。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從湖北來南京工作的小張對筆者說：

像我這樣，大學畢業以後在公辦民營學校工作，沒有編制。工資跟有編制的老師不一樣，比他們低得多。工作與他們也不一樣，分配給他們的是好班，分配給我的是比較差的班。待遇很低，只能維持基本的吃住，07年的時候有編制的老師每人加400元，我們就沒有，當時心理上很不平衡。我們做的事比人家多，反而享受不了同等的待遇。當然不僅是工資低、也看不到希望，擔心失業，擔心學校以後把你辭退，萬一得罪哪個領導，擔心立刻辭退你。在這種體制下，個人看不到希望，有很大的危機，沒有安全感、看不到前途。

這些社會傷害的體驗無疑不再是單純的利益受損，還有更深的體制內與外的區分造成的人格與精神上的挫傷、屈辱與不平等感。這樣，從體制層面的身份政治對社會不公進行分析，為探究承認政治學提供了一個視角。

在霍耐特看來，這種得不到承認的形態意味着一個個體在結構意義上被社會排斥在權利的佔有之外，即作為共同體的合格成員被拒絕享有參與制度秩序的權利<sup>④</sup>：

即他未能享受一個成熟合格的、平等地賦有道德權利的互動夥伴的地位。對個體而言，被否定了社會性地有效的權利要求，就意味着侵害了主體間的期望，這種期望使個體作為具有道德判斷能力的主體而得到承認。在這個意義上，這種蔑視經驗十分典型地導致自尊的失落，即喪失作為在法律面前平等、與周圍所有人進行交往的互動夥伴而自我相關的能力。

對於當前的中國社會而言，這種得不到承認的狀態以身份不平等的形式表現出來；換言之，承認政治學與身份政治學緊密相聯。這是霍耐特的分析不及深入之處，也是承認政治學必然遭遇的中國處境。

在社會不公的背後是資源分配方式的身份等級制，這一判斷質疑的是我們這個社會結構的分層原則。現代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形成在於其社會分層依據的是個體的財富、聲望和權力。當今中國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其內含的是以佔有權力多寡的身份等級制來分配社會財富的前現代社會的邏輯。身份等級制屏蔽了處於社會結構下層的群體公平參與社會分配的機會。大量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者、其他弱勢群體成為「發展的代價」，為改革支付成本卻不能對等地享受改革與發展帶來的利益。

由此造成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產生了兩股對立的社會分層趨勢——上升和下降的社會階層。動態的上升階層處於金字塔的頂端，即所謂的「不落空階層」<sup>⑤</sup>：

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典型的「不落空」現象：在國家政權層面上總體性血緣資本代際交換，強化了不同資本的可轉化性，這就是「不落空」現象，換言之，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佔有的風潮中，都沒有落下他們。

與之相反，下降的社會階層主要是原有的工農階層經體制改革以後處於社會再分配的下層。這個階層的下降趨勢主要是由於一些不公正的社會政策與前現代的社會關係使其固化在金字塔底層。

香港學者蘇耀昌在分析當代中國社會的貧困時強調經濟改革重構了社會等級，在市場化過程中各種原有的文化和權力資本參與到經濟發展之中，強化了所有者的權力，形成了所謂的「新型經國家干預的階層分化社會」(a new state-mediated class-divided society)。部分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個人利益，造

當今中國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其內含的是以佔有權力多寡的身份等級制來分配社會財富的前現代社會的邏輯。身份等級制屏蔽了處於社會結構下層的群體公平參與社會分配的機會。大量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者、其他弱勢群體成為「發展的代價」。

成「官員的資產階級化」(embourgeoisement of cadres)，同時，城市的經濟改革削弱了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導致「國企工人的半無產階級化」(the semi-proletarianization of state workers) ⑥。這延續了社會學中轉型理論對中國的分析思路：市場化重構了社會等級。

本文要強調的是，這種社會等級實際已經固化倒退為一種社會身份。這一點可以以農民工為例來看，目前，中國二億農民工的艱難處境實際上受制於不平等的社會身份與社會關係。對於一個事實上已經進入生產領域的工人來說，被人為地烙上了「農民工」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身份標記；而馬克思在界定工業化過程中農民轉化為工人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時，是以進入生產領域為基本前提，而不是人為的社會身份。從這一點來看，「農民工」的被(身份)政治化，而得不到基本的社會(公民權)承認，毫無疑問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是世界現代化歷史上的反常與變異，反映了社會分隔分離政策代替了公平競爭環境下的社會自然有序分層。

2009年7月21日，湖南《瀟湘晨報》報導了湖南省耒陽市一百多名在深圳從事建築業的工人集體得了塵肺病，卻因為他們是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而難以得到應有的賠償⑦。隨後有幾十家媒體跟進報導了湖南張家界市一百多名在深圳從事建築業的工人集體罹患塵肺病的「塵肺門」事件，這些工人同樣因為勞動合同的缺失而難獲賠償⑧。有人問道，為甚麼在中國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進入城市的農民不能自然轉化成城市工人？為甚麼當下的中國工人階級一直處於半無產階級化狀態⑨？中國農民工因人為的制度障礙而導致的「雙重異化」和「雙重從屬」狀態是馬克思對工業化的觀察所始料未及的⑩。權利缺失的根源實際上在於現行的身份政治和社會分離政策。

改革之所以製造了大量的社會不公，在於改革不僅沒有改革掉前現代的身分政治，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轉型，而且是以此為平台實現了經濟總量的極快積累。改革犧牲了底層階級的利益，這樣改革的後果導致發展意味着以一部分人剝奪另一部分人為代價。

## 二 身份政治：改革的幽靈？

改革之所以製造了大量的社會不公，在於改革不僅沒有改革掉這種前現代的身分政治，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轉型，而且是以此為平台實現了經濟總量的極快積累。改革犧牲了底層階級的利益，有人視之為當然，認為這是改革的必然代價。這種觀點已經意識形態化，甚至成為上層社會對待發展的普遍社會心理。這樣改革的後果導致發展意味着以一部分人剝奪另一部分人為代價。正如：張家界建築工人在深圳維權時，接待他們的政府官員告訴他們：美國今天能這麼發達，也是因為在1950至60年代犧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你們的事是歷史遺留問題，是發展的必然代價。這是歷史的欠賬，現在也沒法追究是誰的責任。深圳市政府能給予人文關懷，若在內地你們根本無法找政府⑪。

「代價論」的意涵不言自明——作為社會底層群體只有作為代價被犧牲掉。但是當代價愈來愈大、社會階層的裂縫遇火即爆，社會怨恨與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時，改革這艘船將置整個社會於何種境地呢？不言而喻，中國經濟改革彰顯出分配原則上的身份政治圖景，如同一個幽靈，窒息着整個社會的活力與社會整體的團結和諧。

在當今這個以利益為主導的社會中，社會不公突出地表現為資源分配方案、資源分配格局、資源佔有方式的不平等，社會財富已經逐漸集中在「不落空階層」。通過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分隔，使一部分人以既定的社會身份參加了體制內分配，形成了大魚—小魚—蝦米層層分級的利益集團，然而更多的人被屏蔽在再分配體制之外，累積成為金字塔底端的部分。

金字塔型社會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兩極分化與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的結構源，如同一隻怪獸愈來愈猙獰展示着它的身段。「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昭示的是怎樣一種社會不平等狀況？2009年末，有媒體報導南京安東門一農民工因無衣禦寒而凍死於橋洞的慘狀為此作了詮釋<sup>②</sup>。

兩手空空都是因為沒有權利，范伯格 (Joel Feinberg) 說：「有權利，我們就能『活得像人』，就能注視他者，就能在根本上感到人人平等。尊重個人……可能僅僅是尊重他們的權利，……所謂『人類尊嚴』，可能不過是可承認的肯定各種要求的能力而已！」<sup>③</sup>從這點來看，不斷鳴笛的群體性事件說明中國社會中爭取承認之旅在吶喊中已經上了征途。

不得不說，體制內的層級分配與體制外的被拋棄，使人們在怨恨中惶恐不安，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也失去了幸福生活的樂趣。價值被抽空了，剩下的只有利益，令人生厭又令人在顫慄中夢想不已。中國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帶來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繁興。但是，在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社會不平等拉大了，其結果是兩極分化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伴隨的是結構性的社會怨恨與群體性事件，而一個因社會政策的公正性而產生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始終未出現。

一個現代經濟體的發展為甚麼不具備現代性的特徵？在現代化以前，很多古老的帝國統治形態也創造了經濟繁榮的奇迹，在福柯 (Michel Foucault) 看來，古代性與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國家權力的結構發生了根本的位移。古代社會的國家權力就是統治權，以王權為中心的統治階級的權力，這種古老的法理，將權力視為權利，背後是整個的階級利益，擁有這種權力就擁有了交易和交換的經濟功能<sup>④</sup>。現代社會因為公民權的普遍覺醒，社會財富不再被少數權貴階層所佔有，社會不再以佔有權力的多寡來分配資源，而是按照公正的社會政策分配給每個公民。現代社會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根本位移，不再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統治權被代議制的公共權力所代替。這是社會平等與社會和諧的前提，如果達不成這樣的社會目標，繁榮與發展的背後必然就是犧牲，製造大量「改革的代價」。以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社會公正來判斷，這種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倒退。

中國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帶來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繁興。但是，在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社會不平等拉大了，其結果是兩極分化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伴隨的是結構性的社會怨恨與群體性事件。

### 三 結構性的社會暴力

身份政治的第一個惡果是直接以暴力的方式剝奪一個人（一個群體）的權利和自尊。霍耐特將之稱為「強暴的蔑視形態」，在他看來，這種蔑視形態就是一個人被強制地剝奪了自由支配其肉體的一切機會，這種體現在拷打和強暴中的

肉體傷害摧毀了一個人的自我和社會性存在的基本自信，同時影響到與其他主體的一切實踐交往<sup>⑤</sup>。在今天的中國，這種體驗是很多孤立無援又無法自衛者所遭受的社會暴力。按杜茲納 (Costas Douzinas) 的解釋，這種「壓迫和統治是公共權力或私人權力的罪行。這兒的罪犯通常是政府及其官員和法規」<sup>⑥</sup>。

當今中國社會正日益讓更多的人體驗着這種「不平等」與「不公正」，從而累積社會怨恨和社會暴力。四川女孩楊海燕 (房憶蘿) 在她的自傳體小說《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裏描寫了躲避治安員查暫住證，半夜時分逃到山上的經歷<sup>⑦</sup>：

農民工權利被剝奪建立在基本的工人身份不被承認的基礎上，公民權的匱乏嵌入在身份政治的不平等之中。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一次次把累積的社會矛盾推向風口浪尖，不斷擠壓製造出一起起社會騷動和群體性事件。

出租屋門外傳來了大聲的呵斥和踢門聲：「開門，快開門，暫住證！」

「快走！」於是連想都顧不得想，我又拉住麗娟的手，沒命地向不遠處的一個小山坡跑去。雖然我們都穿着布鞋，但慌亂之中，我還是跑掉了一隻鞋。腳下的路非常生硬，我赤裸的左手硌在上面生生地疼，我帶着哭腔說：「鞋，我的鞋。」

「來不及了，他們看到我們牀空着，說不定會追過來。」我只好拼命壓抑着腳上的疼痛沒命地奔跑起來。

「哭甚麼哭，小心治安隊聽到了上來抓人。」

我心下一驚，哭聲嘎然而止，硬生生地將淚水咽進了肚子裏。

從中，我們可以深切體會到農民工在城市遭受的蔑視和屈辱。實際上，這樣的社會傷害正在連年上升。筆者常常看到報導：某地所謂執法或管理人員無端讓那些沒有違法的農民工抱頭蹲在地上，城管人員毆打商販暴力執法等公權力傷害民眾的事件。



農民工處於社會結構底層，長期遭受蔑視。

對社會底層的無端蔑視造成了難以癒合的社會傷害。霍耐特的研究表明：「無論怎樣努力建構合法化的體系和賦予蔑視經驗以甚麼正當意義，拷打或強暴所造成的傷害常常伴隨着個人對社會世界之可靠性的信賴感的急劇衰退，常常伴隨着個人基本自信的崩潰。」<sup>⑧</sup>最終導致社會衰亡。

剝奪權利無疑會導致「為權利而鬥爭」的抗爭，從而引發社會暴力。如果有農民工在維權遭遇暴力之後發生殺人案只是一些極端個案的話，那麼每年一到年末的自殺式農民工討薪就不得不使人從社會結構上追溯它的根源。例如，潘毅等學者的調查表明，建築業農民工的欠薪是包工制度造成的<sup>⑨</sup>。農民工權利被剝奪建立在其基本的工人身份不被承認的基礎上，公民權的匱乏嵌入在身份政治的不平等之中。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一次次把累積的社會矛盾推向風口浪尖，不斷擠壓製造出一起起社會騷動和群體性事件。

剝奪權利引發的另一個社會後果就是普遍社會怨恨氣氛的形成。對於怨恨的社會形成機制，舍勒 (Max Scheler) 分析道：「一個群體的政治、法律或者傳統的地位與其實際的權力，愈是不一致，則怨恨擴散的心理動力就愈強。」<sup>⑩</sup>由此看來，今天中國社會倒逼出了強烈的政治平等訴求與社會經濟不平等之間的逆差怨恨。沿着舍勒的思路，成伯清進一步指出，怨聲載道、人人不滿都是「因為無論是政治意識形態還是法律都強調人人平等，而實際上卻又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平等」。「就當下而言，口惠性的平等 (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和實質性的等級 (從級別到待遇層層細分)，依然存在，並充分體現在任何一個權力運作的儀式和活動中。任何一個受過平等啟蒙的人，遭遇這種情形的時候，內心難免受到傷害而又無可發作。」<sup>⑪</sup>當深圳張家界籍建築工人集體罹患塵肺病而得不到職業病防治所的治療時，一個工人曾疾呼：「你是一家醫院，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人，為甚麼我們不能進醫院檢查身體？」<sup>⑫</sup>在這裏，工人階級的平等地位賦予了他們抗爭的武器，而實質性的身份政治並未真正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這是他們未曾想到的，而推動工人從維權發展到群體性事件的就是這種難以名狀的社會怨恨。社會怨恨被釋放的途徑往往是社會暴力。累積的社會怨恨轉化成社會暴力往往只在瞬間，它是長期遭受蔑視的代價，是爭取承認的集體反叛。

對當下而言，我們需要超越單方面對中國社會矛盾、大量的社會抗爭與群體性事件的維穩與治理視角，從承認政治學出發，釋放和讓渡更多的社會空間，才能促成結構性的穩定。不同群體權利的滿足是社會穩定的前提，獲得承認意味着人們制度性、結構性地被接受進來，否則，弱勢群體對社會不公正體驗的累積必將演變成「為承認而鬥爭」的動力。

從身份政治的視角來看，當下中國的社會不公造成的利益受損嵌入在各種蔑視經驗之中，從而將「為權利而鬥爭」與「為承認而鬥爭」聯結起來。剝奪權利源於身份政治，各種社會蔑視同樣源於身份政治。反對社會蔑視形成的制度和文化的，為承認的政治學展開了道路。

#### 四 從承認政治到社會接納

湯普森 (Edward P. Thompson) 對英國工人階級抗爭的經典研究揭示出社會抗爭的道德訴求邏輯：社會叛亂不僅僅是因經濟困苦和物質匱乏而產生的，相反，

不堪承受的經濟貧苦事實上是根據人們一致的道德期望來加以衡量的。當經濟處境的變化被認為是對默然有效的共識的侵犯時，實踐的抵抗和反抗就出現了<sup>⑳</sup>。

湯普森的認識啟發我們在把握當前中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事件時，超越利益抗爭的單一維度。因為實際上，體制內外分隔以及形形色色的制度層級分割的身份政治，其促進的相對剝奪增加了人們對社會不公的體驗。這似乎印證了霍耐特的觀點：「一切社會對抗和衝突形式在原則上都遵循着為承認而鬥爭這一模式：每一種集體反抗和叛亂行為的興起都可以追溯到一種恆定的道德經驗框架。」<sup>㉑</sup>

從身份政治的視角來看，當下中國的社會不公造成的利益受損嵌入在各種蔑視經驗之中，從而將「為權利而鬥爭」與「為承認而鬥爭」聯結起來。剝奪權利源於身份政治，各種社會蔑視同樣源於身份政治。反對社會蔑視形成的制度和文化的，為承認的政治學展開了道路。

在黑格爾看來，「為承認而鬥爭」是積極的社會運動，有助於社會團結，使個體和整個社會都朝向通往倫理生活的道路上。「主體之間為相互承認而進行的鬥爭產生了一種社會的內在壓力，有助於建立一種保障自由的實踐政治制度。個體要求其認同在主體之間得到承認，從一開始就作為一種道德緊張關係扎根在社會生活之中，並且超越了現有的一切社會進步制度標準，不斷衝突和不斷否定，漸漸地通向一種自由交往的境界。」<sup>㉒</sup>

正是這樣的「為承認而鬥爭」導致了內生性人權的成長，個體的主體性不再建立在外在於自我的社會身份等級基礎上，擁有特權被定罪為一種社會羞恥。每個人平等地享有公民權，人權意味着個體的相互承認，「公民權……表達了相互認可的法律裁判，從而把個人建構成政治國家的公民。社會是通過相互認可而形成的，承認規則以授予的形式賦予個體的社會同一性。」<sup>㉓</sup>社會在主體之間的承認運動中成長起來，創造了一種新的共同存在方式，相互承認建構了公民之為公民的政治權利，重構了社會的疆域。

主體性的成長需要被接納和承認。霍耐特總結了三種不同的相互承認形式：愛、法律和團結。這三種承認形式使個體發展出對社會的信賴、被賦予平等的權利、受到對等的重視，從而在共同體中獲得基本的自信、自尊與自豪。不承認會破壞社會和諧，造成社會冷漠以至社會衰亡的嚴重後果。「為承認而鬥爭」就是反抗各種蔑視，反抗強暴、反抗剝奪權利、反抗侮辱，追求各種形式的承認，確立個體作為共同體成員存在的基本自信、自尊與自豪感。

通過社會鬥爭擴展個人權利，讓「每個社會成員都被賦予了一切權利，有助於使他們平等地表達政治利益」<sup>㉔</sup>。在討論到美國1950和60年代的民權運動時，霍耐特贊成這樣的觀點：「忍受法律上的低權益狀態……必然導致社會羞恥感的麻木……只有通過主動的反抗和抵制才能從這種麻木中解放出來。」<sup>㉕</sup>

對於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在承認政治學的意義上，我們應該把任何社會抗爭、社會騷動與社會反叛當作社會建設的積極力量，接納到社會制度進步的良性互動中來，在衝突中確立道德規範，在差異中建構自我同一。「為承認而鬥爭」對於在當今中國社會的矛盾衝突中推動平等的個體權利提供了批判的意識形

「為承認而鬥爭」就是反抗各種蔑視，反抗強暴、反抗剝奪權利、反抗侮辱，追求各種形式的承認，確立個體作為共同體成員存在的基本自信、自尊與自豪感。在黑格爾看來，「為承認而鬥爭」是積極的社會運動，有助於社會團結，使個體和整個社會都朝向通往倫理生活的道路上。

態，讓那些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損群體、各類被身份政治邊緣化的群體，在主體的相互承認中確立起不可蔑視的尊嚴。這是筆者的夢想，當哪一日社會暴力、社會怨恨、社會冷漠被社會公正、社會信任、社會團結所取代，不再有身份政治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時，社會和諧的景觀將真正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

### 註釋

- ① 參見〈廣東一男子穿內褲提殺豬刀索錢被特警制服〉(2010年1月27日)，網易新聞，<http://news.163.com/10/0127/05/5U0RES2Q00011229.html>；另參見天涯社區，[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803292.shtml](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803292.shtml)。
- ②② 成伯清：〈怨恨與承認——一種社會學的探索〉，《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頁63；61、65。
- ③④⑤⑥⑦⑧ 霍耐特(Axel Honneth)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鬥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85；142；142；142；171；122；126。
- ⑤ 孫立平、李強、沈原：〈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中近期趨勢與隱患〉，《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5期，頁9。
- ⑥ Alvin Y. So,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Classe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3, no. 3 (2003): 363-76.
- ⑦ 〈近百農民赴深圳打工後疑患塵肺病〉，《瀟湘晨報》，2009年7月21日。
- ⑧ 相關媒體報導可參見<http://nmworkers.blog.163.com/>。
- ⑨ 潘毅、任焰：〈國家與農民工：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8年6月號，頁27。
- ⑩ 潘毅在分析當前中國農民工的階級形成問題時，將中國農民工不能自然轉化為城市工人的狀況描述為「雙重異化」與「雙重從屬」。參見潘毅、盧暉臨、張慧鵬：《大工地——建築業農民工的生存圖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9。
- ⑪⑫ 參見沈原、程平源、潘毅：〈誰的責任？——深圳張家界籍建築風鑽工集體罹患塵肺病調查〉，《中國工人》，2010年第1期，頁22。
- ⑬ 中國江蘇網報導：2009年12月17日早上，南京一位市民路過安德門地鐵站137路公交站台的時候，在橋洞下面看見了一個外來民工凍死在裏面。參見〈心酸！氣溫驟降 外來民工凍死南京地鐵橋洞〉，中國江蘇網，<http://news.jschina.com.cn/focus/200912/t268061.shtml>。
- ⑭ Joel Feinberg, *Rights, Justice, and the Bounds of Liberty: Essays in Social Philoso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51.
- ⑮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225。
- ⑯⑰ 杜茲納(Costas Douzinas)著，郭春發譯：《人權的終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311；306。
- ⑱ 房憶蘿：《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北京：現代出版社，2008)，頁22。
- ⑲ 潘毅、盧暉臨：〈誰更需要包工制？〉，《南風窗》，2009年第5期，頁52。
- ⑳ Max Scheler, *Ressentiment*, trans. Lewis B. Coser and William W. Holdheim (Milwaukee, WI: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3.
- ㉑ 湯普森為我們證實了英國工人反叛的三股思想傳統，即非國教傳統、「天生權利」的英國人傳統、下層民眾的反叛傳統。參見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著，錢乘旦等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12。
- ㉒ 引自霍耐特：《為承認而鬥爭》，頁9。